

历史思考 与理论探索 (下)

钟康模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思考 与理论探索 (下)

钟康模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 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日战场是开始最早，结束最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战场。号称东方头号军事强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曾经耀武扬威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初步实现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计划，但最终还是步意大利、德国法西斯之后尘，落得败降的可耻下场。世界的反法西斯在东方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中还是第一次。

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完全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敌当前，中国内部形成了新的团结，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特别是当时左右中国时局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握手言和，从十年内战流血转为重新合作，并且以此为中心，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民族解放革命战争。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终于打败了东方最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历史表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对于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深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其历史经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倡导者，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早在被“围剿”、被“镇压”的恶劣环境中，素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各种努力。“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庄严号召，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发表，更在各爱国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开端。同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在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全面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在这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出现了抗日反蒋高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附和反革命转变为要求抗日和民主；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爱国将领奋起抗战，抵御外侮。在全国反日浪潮面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立场的蒋介石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不得不考虑收敛内战政策，打起民族斗争的旗号。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正确地分析了代表英美利益的蒋氏集团有可能出现转向抗日的变化，确定了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方针。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着重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同时，在此文件中，中共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这是我党政策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它对于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具有重要作用。8月25日，党中央致函国民党，批评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不抵抗主义，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立场，表示愿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中国共

产党放弃反蒋口号，采取逼蒋抗日方针，促成国共重新合作的一个重要文件。9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下达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并委派潘汉年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谈判。但蒋介石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一贯的反动立场，妄图通过谈判“收编”红军并继续执行其“剿共”计划。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与蒋介石等人进行谈判。由于我党的努力和艰苦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爱国力量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这就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也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进程。

为了推动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尽快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2月至1937年9月，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协商和斗争。在谈判的曲折过程中，我党坚持革命原则，也作了重大的让步。“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应战。8月22日发布了八路军改编命令，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为公布国共两党合作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同意合作抗日。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团结抗日，其客观条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主观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也是国民党政策转变的结果。前者是国共合作形成的关键所在，后者是国共合作形成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合作形成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要看到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对国共合作

形成的积极影响。

(二)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分裂的局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过去不少论著，在谈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往往只注意详叙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特点，而忽视了国共两党合作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谈到国共合作形成后两党的关系时，也是过分强调彼此的矛盾和斗争如何激烈，而忽略了两党合作抗日的显著成绩和重大意义，这是不全面的，它不符合抗日战争的历史真实。无庸讳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后，国民党在一系列攸关抗战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同共产党存在原则分歧，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矛盾和斗争，有时甚至发展到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如皖南事变。但双方都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不破坏抗日合作为界限。所以，尊重历史，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在抗战中，国共合作抗日终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流，而国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仅仅是次要的支流。抗战中存在内战、分裂的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与蒋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迫使后者不至于和不敢于从抗日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蒋介石在抗战中曾发起三次反共高潮，大搞摩擦，这说明他的反动。但也毕竟不敢导致国共合作抗日的破裂，不敢丢掉抗日的旗帜，这又应该说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进步，说明总是制造黑暗的人有时也会表现一点光明。

蒋介石从参加抗日到坚持下来，表明他深知在人民觉醒，共产党强大存在的情况下，抛弃抗日口号，专打内战是必定行不通，要遭到灭顶之灾的。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

开始，它就具有两面作用或双重性格。一面作用、一重性格是国难当头，联共抗日，这在国内来说是爱国的和带有革命性的，在国际上说是站在反法西斯阵线一边的；另一面作用和另一重性格，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把抗日与反共并列，积极反共，制造分裂，这是反人民、反民主和带有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抗日需要和民族利益，后一面不利于抗日战争，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因此，国民党军队的大多数官兵在平津战役、南口战斗、淞沪抗战、忻口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中，尚能英勇作战，奋击敌寇，挫伤了日军的锐气。直到武汉失守前，国民党抗战还是积极的。尽管那是不肯动员人民参战的片面抗战，但也比不抵抗主义进步。正是由于国共合作，两党的军队共同在各地抗日，全国性的抗战才得以展开；正是有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一个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二者互相配合，共同御敌，构成中国抗战的统一体，才使抗日战争能够全面开展，长期坚持，并能取得最后胜利。如果中国只有一个战场，不论是国民党战场，还是共产党战场，日本侵略者就可将其一分为二的兵力集中起来，进行攻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那样：“假如没有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们不宜过分片面强调二次合作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实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凝聚了国内各阶层、各民族共御外侮的民气和精神，从而有力地动员了亿万军民投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掀起了全民抗战。

中华民族的觉醒，当然不是“七·七”事变这一天突然之间

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抵抗日本侵略，开展救亡运动的有大批知识青年，也有爱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他们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产党抗战救国号召的影响。战争爆发，民气空前旺盛，中华民族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全国亿万将士，几亿中华儿女，都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一致，抵抗强敌，发扬了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八年艰苦抗战，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驰骋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是抗日战争中坚力量。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也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不少国民党官兵，把热血洒在抗日沙场上。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抗日团体数以千万计。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各抗日党派、抗日团体及民主人士，纷纷建立了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战时教育服务团，组成了募捐团、慰劳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支前活动，团结民众支援抗战，救亡图存。以国共合作抗日为核心的神圣的民族抗战，震动了素以爱国爱乡而著称的海外华侨心弦，他们欢呼“国共团结抗战方足以符海外侨胞挽救祖国热心抗战殷殷之企望”。因此，海天远隔阻止不了他们关怀抗战的热诚，他们从各个方面支持和参加祖国抗战，“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①到1940年12月，华侨在海外建立的救亡团体达2794个单位，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增至10亿元以上^②。除了在财力上支持祖国外，海外华侨还从人力上援助祖国抗战。在祖国各地，有活跃在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有深入敌后的华侨战地服务团，有出生入死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中国空军“驱逐飞行员中，华侨几占四分之三”，他们“战绩卓绝，尤

①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

②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57册。

其蜚声于空军界”，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①。在沦陷区的广大农村里，农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敌寇，他们竖起“抗日、救国、保家、自卫”大旗，号召群众，打击侵略者。鲁西北范筑先鲁西抗日军短时间猛增至二、三十万人；冀中马本斋回民支队、冀南赵辉楼民众自卫抗日军都迅速壮大，发展成了抗日劲旅。延安则成了先进知识青年和爱国人上向往的圣地，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和仁人志士从四面八方奔向那里。他们之中，有毁家纾难，远从侨居的东南亚，经过万水千山而来的；有放弃较为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而来的。这些青年和爱国人士经过短期学习后，很快奔向各个抗日根据地，参加艰苦的抗战工作。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浙江、广州、武汉等一些高等院校迅速往后迁移，分设于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等地。许多学生、教授抱着为国效力，誓不以校资敌的热忱，不辞劳苦，长途跋涉徒步前往，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顽强不屈精神。总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中华民族团结觉醒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在亡国灭种和残酷战争的现实面前，显示出了伟大的民族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

无论从整个民族看，还是从人民中的多数个人看，情况都是这样。大敌当前，中华沸腾，万众一心，抗击倭寇。在战场上，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爱国将士，他们都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英勇献身精神，震撼敌胆，当时的悲壮情景，正像《义勇军进行曲》所激昂高歌的那样：“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去阻挡敌军炮火，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秦始皇时期开始修建的实际长城在炸弹大炮轰击下很容易摧垮，但中华民族用民心民气和民族精神筑起的万里长

^① 《现代华侨》第2卷，第10期，第21页。

城是始终摧不垮的。八年抗战，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牺牲，中国人民用几百万、几千万人的血肉筑起的一道反法西斯的铁壁铜墙，他们的肝胆血肉不止去涂炭在中国土地上，也涂炭在缅甸等海外战场上。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的牺牲精神！敌后战场上的人民，尤其表现了这种气概，这种精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同仇敌忾，百折不挠，艰苦卓绝地战胜了日本法西斯强盗惨绝人寰的“扫荡”、“蚕食”、“清乡”、“封锁”，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我们说，一个优秀的民族，必定是又智慧又勇敢的民族，当它需要付出牺牲以求得生存和光荣的时候，人民就能义无反顾的去实践。中国人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中，把觉醒变为自我牺牲，无数事实，令人可歌可泣。历史告诉我们，国共团结抗日，全民族抗战的实现，使中华民族这个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保家卫国、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最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中国共产党成了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因此，日本侵略者的对手，再也不是甲午战争的清政府，也不是“二十一条”时的袁世凯和“九·一八”事件中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了。日本法西斯现在的对手是一个由共产党发挥伟大作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觉醒的中华民族，是全中国人民。这就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愈陷愈深，最终落得败降的可耻下场的根本原因。

国共合作抗日的第二个成果，就是国共两支抗日力量互相支援，共同抗敌，粉碎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速战速决、迫使中国立即降服的幻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配合，又迫使敌寇分兵把守，顾此失彼，从而极大钳制和消耗了侵华日军，打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扩张计划，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日本帝国主义当权势力中大部分人沉浸在一片乐观之中，他们确信日军只消“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陆相杉山元奏报天皇，事变能够在一个月左右解决。参谋本

部制订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扎北平一带的中国军队只需二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也不超过三个月。^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确认代表中国两大对抗势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难以合作，中国是一个不能统一的缺乏自卫能力的弱国。因此，他们狂叫多则一年，少则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便可结束侵华战争，使中国这个西邻弱国屈服，向日本俯首称臣。^②但是，中国并没有屈服，日本也没有在短期内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在中国战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相反，日本法西斯侵略军却在中国伤亡惨重，欲战不得，欲罢不能，最后以败降收场。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赴国难，全国人民集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之下，同仇敌忾，坚毅不拔，奋击日寇侵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早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侵略！”^③中国共产党忠实地贯彻执行了自己的抗日主张与庄严宣言，胜利地领导了平型关战役与百团大战，有力地戳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人民游击战争更是中国人民军队抗击日寇的主要作战形式，侵华日军深深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战无阵线，攻无目标，处处遭袭击，天天有伤亡。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经过无以伦比的英勇战斗，从敌人手里解放了大片国土，先后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经常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共产党在敌

① 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卷9，东京1964年版，第17～18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2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29～330页。

后战场上，把敌人后方变成了对敌作战前线，顶住近半数日军和全部伪军把敌人后方变成了对敌作战的资源；把敌后广大的人力由敌人可以驱使的后备军，变成了抗战的前沿部队和后备军。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军民的英勇抗战，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它大量在歼灭和牵制了敌人的力量，从根本上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亚洲的野心，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在北进（对抗苏联）、南攻（对付英美）和解决“中国事变”问题上，长期处于矛盾混乱的状态，在战略上陷于拆东墙补西壁，挖肉补疮的被动地位。

至于国民党方面，它虽然被反动集团所统制，但是，在民族敌人大举入侵，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多数国民党人是爱国的，是要积极抗日的，民族败类，汉奸毕竟是少数。所以“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抗战初期的国民党、蒋介石在对日作战中，是积极的，奋力以赴的，毛泽东当时就曾恰当地评价“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②。在此期间，国民党、蒋介石组织了几个大型会战，领导了伟大的上海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血战日军，使日本侵略军伤亡惨重。“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③。平型关、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沮丧了敌人的士气，使全国军民抗战精神为之一振，为中国长期抗战奠定了初步基础。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集团的抗日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执行了统战政策，对国民党蒋介石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7页。

石相待以诚，相忍为国，又联合又斗争，致使国民党军队始终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抗击着 50% 左右的侵华日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会战二十二次，主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①。这些大小会战牵制和消灭了日本侵略军的不少兵力，从而减轻了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压力。当时毛泽东就指出：“没有正面的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② 所以，纵观中国抗战全局、我们应该冷静地客观地评价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战场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两个战场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正由于中国土地辽阔，又存在两个战场，才迫使日军分兵把守，顾此失彼，被拖住了大量兵力。一般来说，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地位，同样重要、相互支持。前者国民党控制着，后者共产党控制着。两者在战术战役上的直接配合虽然不多，但在战略上的配合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非常明显的，缺少一个战场，都不能持久抗战，更谈不上最后胜利。毛泽东曾恰如其分地具体论述过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他说：“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正是由于两个战场互相依存，互相配合，歼灭了大量侵华日军，造成对日军的严重牵制和巨大消耗，才使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深深地陷了下去，不可自拔，不得不延期或停止实施其进一步的侵略扩张计划。

当然，我无意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国民党领导集团，企图在抗战胜利后，维持其原来的反动统治，所以害怕人

① 《抗战期间各期敌我大小战斗次数统计表》，台北市文海出版社 1972 年版。

② 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1939 年 1 月 2 日。

民群众，坚持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如果执行这条路线，势必导致抗战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则不仅要求驱逐日寇出中国，完成民族革命，而且要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因而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主张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打一场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全面抗战路线，是处于劣势的中国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唯一途径。所以，就是国民党还在积极抗战时期，两党在抗日路线上的矛盾和斗争也是明显存在的。但是民族大敌当前，全国军民充分认识到，只有团结战斗，共赴国难，才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在已经觉醒了的中华民族面前，任何政党或个人，反其道而行之，必为中国人民所唾弃。团结抗日，是全民族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不论国共两党的斗争如何激烈尖锐，而始终把它局限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政府中的少数反动分子，虽然多次发动反共高潮，但是迫于中共领导下的全民族的压力，始终不敢发动全面内战，公开投敌。所以，总的说来，两支抗日力量，在本质上是互相支援，共同抗击民族敌人的，国共合作抗日，“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的贡献”^①。

总之，当年贫弱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血战八年，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其根本原因就是“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维护着团结抗战的大局，是全民族团结御侮和抗战到底的“台柱子”。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①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人民日报》1982年7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0页。

的旗帜下，中国军民威武不屈，百折不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数不尽的牺牲，以弱兵抗强敌，不但保卫着自己的民族生存，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也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承担了历史性的光荣责任。在八年艰苦抗战中，中国军民经常抗击着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日本陆军的 70%~90%。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为了中国和世界避免法西斯暴政的统治，近 2000 万中华儿女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中国抗战，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一样，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正如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所指出的：“中国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

历史道路是曲折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力量的推动下，全国停止了历时 10 年之久的民族分裂战争，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再度合作，对中国抗日战争及中国历史进程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说：“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两党合作关系，进行了积极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反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时，我党正确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及时克服了党内存在“左”右倾路线，坚持了两党合作抗日，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逐步强化了它的反共、反人民政策，造成两党关系的摩擦、僵持等不协调状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又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改善两党关系、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的长期努力。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发动了反革命内战，在中国历史上重演民族分裂战争的惨剧，致使曾经一度光荣过的国民党被历史唾弃，而我们的祖国也至今未能实现完

全的统一。

最近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宿愿，曾多次向台湾国民党当局提议，进行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一国两制”的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台湾国民党应当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认清形势，捐弃前嫌，作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抉择，在时代的召唤下，完成中华民族统一的千秋大业。

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述评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也开始改变过去对日妥协投降的政策，进行了为期8年的抗战。当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的时候，驻守当地的国民党26军官兵奋起抵抗。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10日，提出正式抗议，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如果中国“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同仇敌忾，“对敌寇狠命之一击”。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开始向华北调兵遣将，实行抗战。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宣布进入对日作战。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的时候，国民党第五军张治中所部立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郑重宣告中外：“中国之领土主权，已遭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这是国民党的第一个抗战声明，措词是“应战”，说明国民党抗战不够坚决，是被动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抗了四年，才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颇有讽刺意味。

国民党当局为什么要一反前态，实行对日抗战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日本侵略严重危害了四大家族的利益，不抗战不行。四大家族在东北的利益不大，其利益主要集中在华中及华